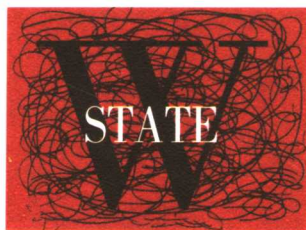


人文译丛
总主编 ◆ 何怀宏

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书系



[德]克劳斯·奥菲 = 著 郭忠华等 = 译

福利国家的矛盾

Contradiction of the Welfare State

吉林人民出版社

人文译丛
总主编 ◆ 何怀宏
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书系

[德]克劳斯·奥菲 = 著 郭忠华等 = 译

福利国家的矛盾

Contradiction of the Welfare State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利国家的矛盾/(德)奥菲;郭忠华等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4

(人文译丛)

ISBN 7-206-04964-8

I.福… II.①奥… ②郭… III.福利国家—福利制度—研究—西方国家
IV.D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7256 号

福利国家的矛盾

著 者:[德]奥菲

译 者:郭忠华

责任编辑:崔文辉

封面设计:孙 丹

责任校对:叶高等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网 址:www.jlpph.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431-5382547

印 刷:长春市永恒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9.25 字数:26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206-04964-8

版 次: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 000 册

定 价:2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 序

中国乃一文明古国，而人文精神又于其间特见其长。“周文”已灿然可观，而孔孟老庄荀韩等先秦诸子更大略厘定此后二千年中华文化发展基本格局，且时有奇芭竞放，异彩纷呈。然近代以来遇强劲欧风美雨，不免花果凋零。究其因，既有外来文明之横决，亦有自身后继之乏力。

今日世界一体，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孤立发展乃至生存，古老的华夏文化更有从域外接引各种源头活水之亟需。百年来国人译事多多，今不揣浅陋，亦立此一“人文译丛”，名称不憚其大，俾使各种有价值译著多能收入其中，且有愿为中华人文复兴略尽绵薄之意焉。

译丛取材选目则不吝其小，且力求主题相对集中，现约略勒成数专辑：一曰西方古典思想与人物，尤以古希腊为要。二曰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特重近代以来作为西方思想制度主流之自由民主的发展。三曰知识分子与自由市场，全球化使我们皆卷入市场经济，而人文知识分子对此的态度尤可玩味。四曰基督精神与人文，此种超越性大概正是较现实的中华人文所需特别留意处。五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思想，藉此希望国人眼光也能注意我们近邻心灵的深邃。六曰《学术思想评论》，由贺君照田主编，其中有译有评，最近几辑尤注意中西历史交叉延入“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

数年来能有此初步实绩，端赖吉林出版界领导周君殿富、胡君

维革的大力支持，及责编与诸多译校者鼎力相助。“十年数木，百年树人”，人文复兴并非“指日可待”之事，我们愿使“人文译丛”成一长久的事业，除继续充实现有专辑外，亦将开辟新专辑，并深祈此一事业继续得到各界同人的关注与支持。

何怀宏

2002年11月18日

谨识于北京西郊泓园

中译者序言

克劳斯·奥菲 (Claus Offe), 1940 年 3 月 16 日出生于德国柏林, 1965—1969 年, 任教于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和社会学系, 并于 1968 年以《成功原则与产业劳动》的论文获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后来曾任比勒费尔大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教授, 现为柏林洪堡大学政治社会学和社会政策专业教授。同时, 他还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学院、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波士顿大学等著名大学的客座教授。对于国内读者来说, 奥菲是一位并不为许多人所熟悉的思想家, 目前国内有关奥菲的资料和论文也并不多见。然而, 国内对他个人的相对忽视并不代表其思想价值上的无足轻重, 在当代英美的学术界, 他是一位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 他被誉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成员, 曾师从当代著名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他对资本主义国家内在矛盾所做的洞幽烛微式的研究在许多方面曾启发了哈贝马斯、吉登斯等当代西方学术巨擘。吉登斯在评价奥菲时说道: “为了说明有关资本主义国家主要矛盾的一些相关思考, 我们可以参考奥菲有关这一问题的论述。……这些论述已经产生了大量富有启发性的经验研究。” (参阅《社会的构成》第 449 页)

本文集的大部分论文写于上世纪的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 当福利国家遭到普遍怀疑和激烈批判的时候。尽管这些论文距离现在已经有 20 多个年头了, 但是, 它们围绕着资本主义与福利国家之间的共生和张力关系, 深层次、多角度地解构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积重难返的矛盾。从这些论文所反映的内容上看, 可以说, 它

们一点也没有过时。从总体上看，这些论文主要是围绕着下述核心论点来展开其论述的：“尽管资本主义不能与福利国家共存，然而资本主义又不能没有福利国家。”（参阅本书第一章）具体地说，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以普遍交换关系的存在为前提，但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却存在着一种累进性“自我瘫痪”（self-paralyzing）的倾向，表现在垄断、贫富分化和经济危机等方面，这些倾向既使劳动者日益脱离了市场交换关系（失业），也使越来越大部分的资本从市场关系中撤出（找不到投资渠道）。这种自我瘫痪的性质不可能通过资本主义经济系统本身得到克服，而且越来越危及到整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存在。为了维持普遍交换关系的存在，维护资本主义国家赖以建立的基础，政府（本书在术语上称作“政治—行政子系统”）就不能再停留在“守夜人”的角色上，而必须积极采取措施以克服资本主义经济系统所具有的这种自我破坏性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福利国家的全面建立意味着政府功能的全面扩张，福利国家通过一系列措施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进行调节。例如，通过教育、培训等措施来提高劳动者的市场销售能力，通过无所不包的福利措施使劳动者免受市场所带来的痛苦，通过大规模基础建设等方式刺激劳动力与资本之间的交换，通过“共同决策”、“共同投资”等方式来增加市场的可预见性，等等。到20世纪60年代，福利国家的人为干预政策已经遍及社会各个领域，政府成为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主要组织者了。

但是，作为结果，这些旨在维护资本主义交换关系的福利国家措施，却越来越导致其悖谬性的后果，这些后果主要表现在：全方位的社会保障措施降低了劳动者参与市场交换的心理动力，使他们心安理得地躺在福利的“摇篮”里睡大觉；福利国家在降低人们从事工作的心理动因的同时，还强化了工人和工会的权力，增加了他们讨价还价的能力，使福利国家越来越背上沉重的包袱；福利国家强加在资本上的各种干预措施破坏了市场的运作机制，使资本投资

越来越取决于国家政策，而不是市场机制；福利国家的税收越来越成为资本不堪忍受的负担，等等。作为总体结果，福利国家旨在维护市场交换关系的政策却使交换关系的存在越来越成为不可能。这样，就形成了资本主义与福利国家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资本主义依赖于福利国家，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又不能与福利国家共存。20世纪7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者主张废除福利国家，重归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但在奥菲看来，在20世纪晚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背景下，这种设想无异于“过时的中产阶级理想主义者的白日梦”而已。“福利国家令人尴尬的秘密在于：尽管它对资本主义积累的影响很可能是破坏性的，然而，废除福利国家所带来的影响将简直是毁灭性的”（参阅本书第一章）。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与福利国家之间相互依赖而又内在紧张。福利国家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商品化与降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政府干预与财政收入、计划与行政理性、合法性与效率等维度上，表现在自由民主制度内容与形式的分离上。

本文集能够出版，首先得益于作者克劳斯·奥菲的支持。2004年岁末，当笔者去信谈起准备出版其论文集时，他不仅慷慨授予了这些论文的中文版权，而且还对笔者翻译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有求必应、细心解答。必须说明的是，按照奥菲教授的最初设想，他还准备对这些论文做进一步修改，增补一些他近年来所写作的有关福利国家研究方面的论文，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这一愿望最终未能实现。本文集能够出版，也得益于我硕士时期的导师，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陈炳辉教授的指导。数年前，当笔者在厦门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时，在陈炳辉教授的示意下，我选取了当时几乎毫无了解的奥菲的国家理论作为硕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并以“克劳斯·奥菲关于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矛盾的理论”通过了硕士论文答辩。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我曾将本书的大部分论文翻译成中文，而且鉴于这些论文所具有的意义，萌生了将它们结集出版的念头。这一夙

愿是在天津师范大学刘训练博士的帮助下得到实现的。2004 年末，当笔者到天津师范大学参加“当代西方政治思潮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学术研讨会时，有幸结识了该校教师刘训练博士。两人偶然谈起克劳斯·奥菲的“国家理论论纲”，竟大为投缘。当我谈起结集出版奥菲论文集的想法时，得到了他的大力帮助，使得本论文集得以顺利出版。

本书的翻译是合作的结晶，我谨向我的两位合作者致以诚挚的谢意，他们是上海师范大学的陈志杰博士（翻译第六、八、九、十、十一章）和中山大学政务学院的谭兵老师（翻译第五章）。笔者在翻译其他章节（第一、二、三、四、七、十二章）的同时，还对前两位译者的译稿进行了校译和修改，对全部译稿进行了统校和定稿，因此，凡文中出现的错误和问题，当由笔者来承担。必须说明的是，本书所选编的论文涉及多个学科和领域，通常通过细致入微的概念分析和绵绵入理的逻辑思路来展开其分析，这不仅增加了理解的难度，而且还增加了翻译的难度。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力求保持原文的风格，但由于有些概念目前在汉语界尚缺乏对应词（如 *decommodification* 概念）以及中西方表达习惯上的差异等原因，使得其中部分概念读起来会显得较为生硬、难解。由于这些方面所带来的不便，笔者谨向读者表示由衷的歉意。作为这些论文的读者者和翻译者，笔者对这些论文的总体感觉是，翻译它们需要有足够的耐心，阅读它们也需要有足够的耐心。

最后，我谨向吉林人民出版社的崔文辉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他的细致和耐心减少了本书的错误。同时，我也向中山大学政务学院任剑涛教授、肖滨教授、何高潮教授和吉林大学行政学院的曹海军博士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在本书的翻译和出版过程中给予了友好的支持和帮助。

郭忠华

二〇〇五年仲夏于中山大学

目 录

中译者序言	1
第一章 现代福利国家的矛盾	1
第二章 国家理论论纲	17
第三章 自由民主内容与形式的分离	28
第四章 危机管理的危机：政治危机理论的要素	44
第五章 “不可能管理性”：保守危机理论的复兴	72
第六章 社会政策与国家理论	96
第七章 合法性与效率	127
第八章 政治文化与社会民主党的管理	144
第九章 竞争性政党民主与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	157
第十章 消费政策中的替代性战略	184
第十一章 欧洲社会主义与国家的作用	202
第十二章 福利国家与社会主义未来的反思	214
译名对照表	258

第一章 现代福利国家的矛盾^①

二战以来，福利国家已成为发达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主要和平原则。这一原则主要由以下两个方面组成：首先，风险是市场社会的典型特征，公民将遭受风险之苦并由此产生特定需要，而国家则负有为他们提供援助和支持（不管是用钱还是用物）的明确义务，并且这种援助是作为公民的合法权利而提供的。其次，福利国家建立在正式承认工会作用的基础上，包括集体谈判和公共政策制定等方面的作用。福利国家这些结构性要素被认为具有限制和减少阶级冲突、平衡不对称的劳资权力，并因而超越毁灭性阶级斗争和阶级矛盾（它们是前福利国家，或者说自由资本主义国家最为典型的特征）的作用。总而言之，在战后时期，福利国家作为社会矛盾的政治解决方式受到广泛的赞誉。

直到最近，不论是发达福利国家（如英国、瑞典）的政治精英，还是尚未形成这一原则的国家的政治精英，他们的思想似乎都完全聚焦在福利国家上。对后者来说，如美国，政治斗争的焦点不是福利国家是否合乎需要的疑问，也不是其功能是否必不可少的问题，而是建立福利国家的速度和方式问题。

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这种情况都还一直如此，很少例外。然而，以此为转折点，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和平原则本身被作为怀疑的目标、批判的对象和政治斗争的核心了，这种一度得到最广泛接受的问题解决机制，现在自身变得有问题了。无论如何，对福利国家及其未来的那种无可置疑的信心现在都已迅速消失。我将以这些怀疑和批判作为我们论述的开端，以对下列事实的

福利国家的矛盾

观察作为起点：在战后的欧洲社会，那种几乎得到普遍接受的、用来创造和平与和谐的原则，在 20 世纪 70 年代却成为新的矛盾和政治分裂的源泉。

从历史的角度看，福利国家是一系列因素综合的结果，这些因素的构成随着国家的不同而不同。社会民主党的改革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启发了保守的政治、经济精英，而大型工业工会则是一些最强大的力量，它们争取越来越广泛的强制保险计划、劳动保护立法、最低工资、健康和教育条件的改善、国家住房补贴，以及承认工会是劳动者政治和经济的合法代表等。在西方社会，上述方面在激烈社会冲突和危机的条件下经常加速发展，尤其当处于战争或战后的条件下。通常，这些在战争或战后阶段所赢得的成就都会继续维持下去，而且随着经济的增长和繁荣，会通过对其的改革而不断加入新的内容。根据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福利国家远不是强加于经济系统上的一个沉重负担，而是一个内在的经济、政治稳定器，通过它，可以重新唤起经济发展的动力，并防止经济急剧衰退。因此，一系列完全相异的目标，包括从俾斯麦（Bismarck）为抵制工人阶级运动而采取的强制收购措施，到魏玛（Weimar）社会民主党所采取的社会主义改革，从战争期间的社会政治联合、国防经济，到商业的稳定，等等，都被整合进同一套制度，构成今天的福利国家。正是这一制度所具有的多功能性质，所具有的能够同时服务于许多彼此冲突的目标和战略的能力，使得福利国家的政治安排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使各种彼此冲突的力量结成广泛的联盟。但情况也表明，尽管这些彼此冲突的力量创造和维持了福利国家，但它们在這一制度框架下并不能永远相处下去。今天，福利国家已越来越受到攻击。阶级妥协的机制自身已成为阶级冲突的目标。

右派的攻击

20 世纪 70 年代，剧烈的经济衰退使新自由主义和货币主义的经济思想和政治得到强有力的复兴。这种复兴实质上是对假装能对其病症进行治疗的福利国家所作的根本性批判：与其说福利国家有效地调和了市场社会所产生的冲突，不如说它实际上加剧了冲突，而且还阻碍了社会和平和进步力量（即市场力量）正确有效地发挥其作用。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福利国家机构强加于资本之上的管理（regulation）和税收负担等于是抑制了资本投资的动力；同时，福利国家所认可的要求、权利以及工人和工会所拥有的集体权力，等于是抑制了工人工作的动力，或者至少不能迫使他们像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那样努力而有效率地工作。概括起来，这两方面的结果导致这样一种合力的产生：它既使经济不断衰退，又使期望不断上升；既使经济上产生“超负荷要求”（即通货膨胀），又使政治要求超负荷化（即不可能管理性），这些方面越来越无法通过经济上的产出来得到解决。

显然，如果从相反的政治立场出发，这种分析通常意味着对福利国家的支持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分析本身所蕴含的真理性，很可能比其实际结论的合意性更大。尽管社会民主党左派经常用后者来衡量前者，其实两者都值得进行分别的评估。在我看来，上述分析的谬误主要不在于它所说的东西，而更在于它保持沉默的方面。

例如，从上述保守主义分析的第一个论点来看，这种论点是不是不正确的呢？即在经济增长率下降，国内国际市场激烈竞争的条件下，个体资本家，至少是那些没有享受垄断特权的公司，它们有许多很好的理由来瞻望投资和利润都极其惨淡的前景，来抱怨福利国家，由于它把社会保障税收和一系列规则强加于它们之上，从而进一步降低了它们的利润率。这种观点是不是错误的呢？即通过工

福利国家的矛盾

业关系、集体谈判和其他法律，工会已经获得了众多的权利，并由此形成了强大的工会权力，这些权力已经大到足以使越来越多的工业生产者无利可图，或迫使他们到国外寻求投资机会。还有，这种观点是否也是错误的呢？那就是资本主义企业是依据预期的利润率标准来做出其投资（雇佣）决定的，因此，一旦长期利润率不再对他们产生吸引力时，他们也就相应地不再进行投资，从而造成经济系统的生产率总体上相对下降。

当然，谁都会承认，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率下降、投资失败与福利国家对经济的影响不无关系，但其实还更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的内在危机趋势，如过度积累、经济周期和没有限制的技术革新等。即便如此，如果能够免除部分强加于资本——从而也强加于资本主义社会其余部分——之上的福利国家负担和管制，以减轻资本所遭受的困苦，这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作为实践结果，这种论点正是大部分支持者所希望表达的内容。然而，如果把这一论点的逻辑继续推演下去的话，那么又是谁从福利国家的运转中受益了呢？福利国家以生产系统的存在为前提，为了维持自身前提的存在，它又依赖于福利国家的运转，而这一运转却最终又侵蚀和破坏了其前提。“福利”难道不是已成为仅仅名义上的东西了吗？成为毫无意义的东西了吗？它一方面给资本强加各种沉重的负担而对它进行惩罚，同时也通过通货膨胀、失业或两者兼施的方式对所有其他人进行惩罚。我认为，我们可以从刚才所作的描述性分析中得出非常有价值的见解：与其说福利国家是提供各种收入、服务等福利措施——它们作为公民权利的体现——的独立和自主的源泉，不如说它本身就高度依赖于经济的繁荣和持续的利润。尽管福利国家的设计旨在“治愈”资本主义积累所产生的各种“病症”，但疾病的性质也迫使病人不能再使用这种“疗程”。

一种对上述论点可以想象得到的反驳意见就是，认为资本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政治精英过分“夸大”了福利国家强加于他们之上的

危害，认为在政治博弈中，他们有很好的策略和理由来使福利国家显得比它“实际”上更难以忍受。因此，现在的问题归结起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难以忍受的危害到底是什么？我们如何衡量它们？在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谨记在心的，私人投资者的权力地位同时包含了他对现实进行界定的权力。也就是说，他们所认为的不可忍受的负担，实际上是将导致投资率下降的负担。至少，他们是企图应用退出投资等经济制裁手段，来减少与福利国家相关的各种成本。由于投资者处于这样一种位置，他们“既创造了现实的表象，同时又创造了‘利润被压榨’的效果”，从而有关福利国家是否真正压榨了资本主义的利润的讨论，只能是一种纯粹学术性质的讨论。

保守主义对福利国家进行分析的第二个重要论点就是假定，福利国家具有抑制工人工作的效果。“劳动者不去工作”，这是玛格丽特·撒切尔政治竞选时的标语之一，这一标语使她入主了英国首相的办公室。但是，必须再次指出的是，这一论点的理论分析必须与其政治使用仔细区分开来，理论分析的内容经常与其支持者的意愿大相径庭，但乍读起来也有经验上讲得通的味道。例如，毋庸置疑，与缺乏劳动立法的情况相比，详尽的劳动立法的确可以使工人处于一种有效地反对剥削的地位；强大的、得到承认的工会在工资增长幅度方面实际上可以大于生产率提高的幅度；广泛的社会保障规定使得工人更容易避免某些不合意的工作，至少对某些时候的工人而言是如此；对许多工人而言，覆盖大部分劳动人口的大规模失业保险也使失业变得不再可怕，并因而局部破坏了劳动力后备军机制。因此，总的来说，福利国家已经使劳动剥削问题变得更为复杂，更不可预测。另一方面，当福利国家把一系列规则和权利强加于生产过程中的劳资关系上时，尽管它没有触动生产过程中的权威结构和财产关系，但作为一条，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毫不奇怪的，那就是工人本质上不再如他们所可能做到的那样，有努力工作的动

福利国家的矛盾

机，而且富有效率地工作。换句话说，福利国家保留了资本对生产的控制权，从而也保留了劳动者与资本之间存在的工业和阶级冲突的源泉，它没有建立任何类似于“由工人来控制”的东西。但同时，它又加强了工人反抗资本控制的潜在能力，由此所产生的纯粹效应是，那种从未改变过的阶级斗争格局现在朝着更有利于劳动者的一方改变，生产剥削关系与抵制、逃避和缓和剥削的可能性同时并存，尽管阶级斗争的原因依然如故，但工人们从事阶级斗争的手段已经增加了。因此，毫不奇怪，上述情况日益消解了“工作伦理”（work ethic），或至少需要某些代价极高、但却毫不可靠的战略来加强这种伦理。^②

到目前为止，我的看法是，与左派的批判相反，自由保守主义对福利国家进行分析的两个关键论点，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有效的，在我看来，这种分析的基本谬误更不在于它明确表达出来的内容上，而在于它遗漏的方面。任何名符其实的政治理论都必须回答如下两个基本问题：第一，合乎需要的国家和社会组织形式该是什么样子？我们如何证明这样一种形式是“切实可行的”？例如，如何表明它合乎社会生活的基本规范和实际假设？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要界定一种连贯的变革模式或目标。第二，我们如何实现这样一种模式？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要找到可以促成这种变革的动力和战略。

保守主义对福利国家的分析在上述两个问题上都是失败的。我们首先从后一个问题说起，在今天的西欧社会，即便设想一种部分废除现存福利国家制度性要素的政治战略，而且是一种具有现实希望的战略，那也是极度困难的，更不用说整体上废除福利国家的制度安排了。这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福利国家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结构，废除它与废除整个政治民主、联盟以及从根本上改变政党体系没有什么差别。尽管有些国家偶然出现右翼中间阶级的人民党运动，但要出现一种可以推动如此剧烈变革的政治力量还是不可想象的。而且，政治调查的结果显示，极端自由主义与经济个

人主义之间的总体意识形态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放弃自己从中受益的特殊转移支付、补贴以及社会保障方案等方面，他们在意愿上也相差甚远。因此，在西方政治舞台缺乏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和组织潜流的情况下（如新法西斯主义和权威主义），超越福利国家、复兴完全市场经济的设想，与某些过时的中产阶级理想主义者虚弱的政治白日梦没有什么差异。如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她们在入主其办公室时，必须把福利国家作为一套既定的制度方案接受下来，没有哪一个阶级可以强大到有哪怕是部分改变福利国家制度安排的力量。

然而，更有意义的是保守主义分析的第二种失败，即它根本没有能够证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减去福利国家”的模式将会是一种实际可行的模式。这种不能证明的原因是非常明显的，这也是即使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被付诸实施，那也将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治疗方法的原因。福利国家大规模提供了住房补贴、公共教育、医疗服务以及广泛强制性社会保障计划等。在缺乏这些方面的条件下，工业经济的运转根本是不可想象的。考虑到城市化的要求和条件，工业企业劳动力的大规模集中，技术、经济和地区的迅速变化，家庭越来越丧失了应对工业社会所产生的生活不幸的能力，道德领域日益世俗化，拥有财产的中产阶级的数量变得越来越少而且变得越来越具有依赖性，等等，所有这些方面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典型特征。在这样一种条件下，福利国家的突然消失将使整个社会系统处于一种毁灭性的冲突和无政府状态。福利国家令人尴尬的秘密在于：尽管它对资本主义积累的影响很可能是破坏性的（如保守主义分析所着重强调的那样），然而废除福利国家所带来的影响将简直是毁灭性的（这一事实则为保守主义分析所系统地忽视）。由此产生的矛盾就是：尽管资本主义不能与福利国家共存，然而资本主义又不能没有福利国家。这种情况正是我们使用矛盾概念时所指的境况。保守主义分析的缺陷就是，它着重强调了这种矛盾的第一个方